

郝 建

完美、時髦的話語演出

全球化，已經是商業巨子指點江山的宏圖大志，已經是生產線上藍領工人的競爭壓力和就業機會，它也通過電影電視、牛仔褲和炸雞腿、水墨畫和高峰會上的對襟襖成為世界各地軍政要人和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每當我坐火車受氣，或者收到電信部門的虎豹霸王花發來的無理收費通知或者隨意改號指令時，就會詛咒他們：只有多幾家自由競爭的企業來擠扁你的頭，你才會把我當上帝。

反全球化的浪潮也正在全球化。反全球化的革命群眾正毫不猶豫地利用全球化的通訊手段、跨國組織模式和經濟網絡。從西雅圖的不眠之夜、標語口號到熱那亞八國峰會期間飛向麥當勞的雞蛋和石塊，各種經濟利益集團和不同思想出發點的人忽然很奇怪地集結到一個色彩斑駁的旗幟下。這當中既有美國勞聯產聯的正宗無產階級，又有引吭高歌、雄踞東西方大學講壇的左翼知識份子。看看這「全世界反全球化者聯合起來」的意思，還真有點炸焦肯德基，加快地球轉動的氣勢。

反全球化在哪裡最時髦？在中國 在中國的人文領域和文化知識份子圈子中。

寫文章說事，大多是這樣開頭的：「在今天的全球化浪潮下，張三還堅守著這樣一份獨特的情懷和志氣，是多麼的艱難、多麼的 呀。」有時，也許來點機智煽情、有點文采的反問。我來學造句：「代表我們文化的核心和明日曙光的，不是李四這民族魂靈的泣血謳歌，難道是麥當勞文化生產線上的速成品和哈日一族沒心沒肺的低吟淺唱嗎？」

但是，在全球化的確波濤洶湧得如滾滾紅塵的西方，左翼知識份子的聲音也許還有點潑涼水的勇氣和滴酒不沾的清醒。在我們這裡的人文知識份子話語圈裡，卻讓我看到一種如此時髦，如此眾口一詞，如此高歌猛進的順暢話語流。說實話，我再次感覺到有一點怪怪的。

有些朋友描繪的那個風景似乎跟我自己對身邊生活的感覺不大一樣。他們跟我說中國落後就賴全球資本主義的混蛋秩序；賴攪起金融風暴，搞得周天寒徹的資本大鱷魚；賴跨國公司的寡頭和美國的霸權主義。可我看到的腐朽落後還沒這麼高檔次。看看南丹礦區的主子黎東明，再聽聽說一不二、視人命如草芥的大小莊主的豪言壯語，再看看不該出手時也出手，隨意打擊異己、濫砍（樹、人）濫罰（錢）的李長河、馬向東們，這些人不過是封建皇帝的隔代遺傳和各色農民起義山大王的當代版。他們似乎是從電視劇《水滸傳》、《太平天國》、《雍正皇帝》中直接走下來的角色。那些割去農民李綠松舌頭和把警察杜培武打成殺人犯的大俠充其量也就是封建殘餘、文革餘孽，是大大小小山寨子下來的黑社會。

話語表演不能以故意扭曲中國的歷史或精心掩蓋遮蔽中國現實為手段。中國的基本事實是很

難掩蓋的，我們沒那麼全球化，中國社會內部都出現各種經濟的隔絕、意識形態上的分裂，很多地方絕對是強有力的中國特色，這些是一目了然的。我多次強調，中國只有前現代問題，沒有後現代境遇。我們的主要威脅不是全球化，而是思想文化和自然環境的沙漠化。

我們的一些知識份子營造了一個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對立，但是有時這恰恰遮蔽和扭曲了中國本土的現實。理論家能夠靠著搬運話語、翻炒話語就有資格俯瞰自己腳下的人生嗎？我們的一些藝術家、文藝理論家把自己放進生活了嗎？我看有的朋友是「人在漢營心在曹」，正好扮演了美國、法國的反抗者身份，承擔了西方知識份子的批判職能。他的話語放到美國、法國去正好是清醒、刺激的。「他覺得他的批評實在是利於美國的健康發展的。當今世界無論是中國還是美國，都需要大家去共同關心，共同努力。知識份子的關懷不是為了一己私欲，而是放眼世界。」

一張牀上幾樣夢：誰的反全球化？

強調一種共同規則、強調自由競爭和共通人性的人們對全球化的態度一般較為積極；而那些自認為正統馬列毛的朋友，往往以「我為民族鼓與呼」來自我定位，這些人士比較注意強調全球化、後殖民主義對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衝擊和文化威脅。「正統馬列」們還呼籲為中國的文化和思想建設成就設防。

這就是中國的社會現實和話語情景：充滿了分裂和錯位。這一回，反全球化話語在價值取向和實際政策的訴求上是與當前佔主導地位的國家政策運行相左的，而它與官方權威話語的老牌經典意識形態中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觀念又比較合拍。

在全球化問題上，人文知識份子與搞經濟理論的知識份子又有態度上和價值取向上的很大不同。電影理論中就有人 分聰明、時髦地提出了「東方美學」。至於自然科學理論領域，還沒有聽說要搞民族物理學和有中國特色的天文學的。還好。

就我觀察，反全球化的中國說法大約有幾個構成元素：民粹思想與後殖民話語的混合，對西方左翼話語的選擇性移植和改裝生產，文化大革命情結的當代復活，對文化的固定理解和崇高化帶來的清高和執著。

我並不想在這裡疏理這些關係，而是想強調中國現實和話語的複雜、纏繞、糾結。有許多事實我們還不能直面，有許多理論我們還不能將它僅限制在學術範圍內進行自由的討論。但我們要承認這些。在中國的一本看上去與國際左派話語 分接軌的雜誌上，也有學者點出了其中的許多錯位。溫鐵軍先生說：「誰在反對全球化？中國的國民是要求市場化、全球化的，只是少數內外壟斷集團在阻礙。」

在此情況下，有些中國知識份子也過份熱衷於一種為了說不而說不的話語秀就多少有點不合適。就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產生的自豪感與「我家自古全都有」的大陸心態而言，中、法兩國的知識份子有 分相似的地方，很容易談到一起。但今天我們有些學者的那份靈巧和設計精密，那份顧左右而言他的作秀意識，那份從義憤填膺到低眉順眼的快速切換，是福柯（Michel Foucault）這樣的法國知識份子在鼓吹文革思想時完全不懂的。我們忘記了自己當初是如何在批判的武器面前退避三舍，找到了既安全又鮮花盛開的話語表演場地。在全民族因精神震撼而失語之際，我們的很多人得意於用激揚抒情的花腔高音來說廢話，從此走上了旱地拔琬、凌空飛翔、俯瞰現實在空中做話語表演的雲端高路，也全不在意那話語表演場

上還長著些毒蘑菇。我還有點胡亂揣測，由於對思想上的路徑依賴和自我欣賞的陶醉，有的人成了自己話語的人質。調子唱高了，與國際思想學潮接了軌，與傑姆遜（Fredric Jameson）這樣的左翼教授成了老朋友，於是檔次上去就下不來了。根據我看到的文字，那也是一位元文化大革命崇拜者，雖然遠隔萬水千山，從沒享受過群眾專政的洗禮。

可這一類話語表演有可能對中國現實形成比較大的扭曲作用，把中國許多一目了然的現實關係和感覺層面的痛苦經驗改造成他們嘴下的另一個自由王國。某些中國出口到美國去的「正宗馬列毛主義」教授，為了勝任中國文化專家的聲名，就用話語塗抹了一個中國現實。這種話語煙幕有可能覆蓋在中國的生活之上，造成巨大的虛空甚至假像。有許多時候，聽一些朋友說話簡直覺得恍若隔世，讓人覺得他們是從銀河系以外來的。《妖魔化中國的背後》的作者之一在別人問起他是否當真不知道中國過去和現在的實際特色時，就明確地說自己說話只能考慮自己在美國的生活和職業圈子中的作用。原來，這位先生是在那裡當教授建設精神文明。

與很多知識份子的描述有很大不同，大眾的本能卻是務實的、物欲的、喜好追趕潮流的。我看到，反對國際資本的大學者在跨國資本家撒過來些許散碎銀兩舉辦個把讀書看報獎時沒有堅持不就，也還是照樣奮勇向前。

我琢磨，中國的反全球化話語可能還富於一種「革命情結」。我們潛意識中很容易有一些文革意識形態中的理念：要砸爛舊世界，創造新秩序。對待資本主義經濟秩序，一般百姓倒不至於去設計甚麼「超限戰」。但我們這裡的確有些大知識份子覺得很不是那麼一回事，總覺得應該在推廣現存的交往規範、商業倫理之前應該先重新來過。黃平先生認為：「使人產生一個疑問：誰的全球化？最大的威脅其實是那些跨國公司和跨國經濟，它們威脅到所有民族國家的利益，包括發達國家的勞工的利益。遊戲規則的制訂越來越單極化了。」要照這個思路，我看面對WTO就不是甚麼談判進入的問題了，就得先革命伺候，改規矩。你們發達國家把規矩改好了，改公平了，改得有利於不發達國家「比、學、趕、幫、超」，我再來加入。

怎樣對待這該死的人性

去年暑假期間，我去了雲南，去了中緬邊境的山區。不管是甚麼樣的山區，只要一修通了公路，多麼淳樸、多麼文化、多麼傳統的人第二天就把屋子搬到公路邊上來，馬上開始賣可樂、喝冰紅茶。

面對全球化的庸俗潮流，我們常常忽視一個堅硬的、可怕的現實：人性是懶惰的、逃避自由的、不那麼有追求的。大家都比較喜歡坐享其成，都比較好享受、喜愛自媚、媚俗。「食色，性也。」人就是這麼個俗東西。面對我們自己的這點操行，我們怎麼辦？像《蛇》當中的前蘇聯克格勃少校符拉索夫那樣「用畢生的精力去鍛煉人、錘煉人，塑造新人、更好的人」；還是承認人是生來有其當家作主的權利，他有選擇生活方式的權利，他可以不一定為文化或者高尚活著，而首先為自己的饅頭、窩頭和二鍋頭、XO活著。有的時候，過於喜歡理想主義、偏好遙望烏托邦的知識份子和要求純淨思想的政治家一樣，就是不大喜歡承認個人有選擇的權利，就是愛搞點文化問題政治解決。在法國，中央和地方政府紛紛限制麥當勞的鋪面使用招牌，限制英語電影和電視節目的放映時間等等，不一而足。在中國，政府規定外國電影在電影院的放映時間必須低於30%。

今天，在這裡，真正讓通俗成為通俗還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為通俗說兩句話是一個很先鋒的事情。君不見，鄧麗君、張惠妹是一個隨時被打入另類的「弱勢」人物。許多當老師的都沒收過鄧麗君的錄音帶，許多青年都被沒收過。崔健為甚麼能一直保持當紅搖滾的名聲？也一直靠著真的被打擊或宣稱被打擊維持著自己的另類先鋒地位。也就因為這一條，我多次說過：「最是先鋒鄧麗君。」這種對人性之俗的堅定抗拒甚至使我們成了犯罪份子。諸位讀者大多看過《辛德勒的名單》，這是一部描寫戰爭中的善良人性並對法西斯人格做了深刻剖析的影片。就用曉暢有力的敘事方法來描寫可以理解的人道主義來說，它又是好萊塢式的通俗文化的代表作。可是這部影片迄今為止沒有在大陸進行過公開的、合法的放映，我們所有人看的全是盜版或者非法放映！在開始引進優秀影片的第一年，中影公司就要引進這部影片，政府主管部門在片中看到了裸體鏡頭就要求對方公司允許我們略做刪節。在那樣一個殺人現場，有人看到了裸體鏡頭。看來，在大眾當中和在主導文化的權威面前，有的文化產品的強勢和弱勢是錯位的。最通俗、被許多朋友指責為最強勢的好萊塢大片，在這裡隨時可能是弱勢。佔主導地位的權威話語不僅抑制好萊塢。澳大利亞影片《鋼琴課》被閹割掉重要的關鍵性情節轉捩點、英國影片《四個婚禮和一個葬禮》被刪去要害台詞和「不健康」的同性感情。看來甚麼是弱勢還真要好好想想。我在這裡看到的首先不是全球化和本土文化的問題，而是更為重大、革命的老題材：一個公民有沒有自己的選擇權。「可他們似乎忘了：如果不發紅頭文件，不花工會的錢，中國的百姓有沒有權利看自己愛看的電影；中國百姓能否在電影院享受『環球同此涼熱』？」面對全球化難題和麥當勞境遇，北京學者秋風也是從這個角度來考量問題：「中國的文化不是書架上的四書五經，也不是老莊佛道，而是生活在現世的幾億活生生的、每天都在進行著無數選擇的人們的行動。因此，他踏進麥當勞，就不是在被動地接受麥當勞的文化霸權，而是在主動地創造本民族的文化，因為他選擇麥當勞，是個人的自由選擇。他每吃一口巨無霸，每喝一口可口可樂，都是在為本民族的文化增加新的內容。」

叫我說，到底要全球化還是化全球，還是要看對老百姓每天過日子有甚麼影響，還是要看全體老百姓的感覺，還得讓全體百姓來說話。可不能僅靠幾個官員和大牌學者來「話全球」。

郝建 北京電影學院暨中國電影藝術中心研究生部碩士，發表文化研究、評論多篇。

《二 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 一世紀》2002年6月號總第七 一期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刊文字或圖片，必須先獲本刊書面許可。